1

导　言

1.1　发展和发展理论概念的界定

在发展理论中，“发展”一词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发展理论研究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曾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的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就是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教育。狭义的发展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欠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过渡或转化。这门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迫切需要解决选择何种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而首先由一批欧美国家的学者创立起来的。本书对于“发展”一词是从狭义上使用的，可以将发展简略地定义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展。

由于发展问题在中国是头等重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称作“中国的发展路线”。围绕着发展问题，可以把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途径、发展条件、发展机遇、发展速度等命题基本上包容进去。内容的过于广泛，会影响理论阐发的深入。因此，本书的

内容以阐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本身的基本观点为重点，而对于与发展相关的其他问题只作简要的阐述。从发展本身的内涵来看，可以分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人的发展四个方面。本书将重点讨论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在理论认识上的依次递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1.2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线索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1894 年有一位叫卡内帕的意大利友人写信给恩格斯，请他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回信中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段话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可见，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终发展目标。

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不同于它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是靠道德说教所能实现的，它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为其物质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保证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同时，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社会形态。

恩格斯关于人类与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3 页。

义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论”错误地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去征服自然，结果却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即生态环境。他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①。他特别向人们提出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 这就是说，人类的行为如果违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到今天，这种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列宁是在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的现实条件下考虑发展问题的。显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当时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仍必须朝着这一目标一步步逼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③。与此同时，列宁在发展问题上，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他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④

毛泽东是在比俄国十月革命时更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现实条件下考虑发展问题的。他理所当然地把发展的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早在建国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4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3 页。
③《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 页。
④《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6 页。

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就明确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① 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更把中国经济建设能否搞上去，提到是否会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的高度。可惜，从 50 年代后期起，随着“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并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发展思想也陷入迷误。

1.3 近代中国的发展理论线索

近代中国的历史，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抵御列强侵略和变革旧政权以解放生产力，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但是，除了各种政治改良和革命的理论以外，也有其他一些发展理论，它们中的多数在当时虽不免坠人空想而不切实际，但在今天看来，其中也包含一些合理的、可以借鉴和参考的东西。在本节中，将对这些发展理论择其要者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并进行一定的梳理。

一、以商富国——洋务思想家的发展基本理念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封建统治者甚至认为对外通商是对外夷的恩赐。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指出：纵观直到近代为止的东西方贸易历史，可以看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市场持续而典型的流向欧洲市场的商品是茶叶和生丝，而流回到亚洲市场的最典型的货币则是白银。但是，西欧等国的重金主义者对白银的流

①《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66 页。

出持批评态度，并寻求一种不用银结算而能获茶叶的贸易方式。首先，他们尝试用本国的工业产品作为等价物而未获成功。之后，则试图以印度鸦片为媒介，通过英、美、中的三角贸易关系把中国卷入国际市场。但是，这种贸易关系的走私色彩非常浓重，而且交易品种和区域也非常狭窄，不能满足国际市场和中国社会发展之需，是迟早要改变的。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对象，对外通商已成定局，欲拒之而不能。当时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对外通商是大势所趋，并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发展对外贸易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意义。因同情太平天国而遭清廷通缉、遁居香港的王韬认为：“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靠通商富国的。曾在欧洲游学多年的马建忠在其《富民说》中也用进出口差额来解释通商致富论，他说英、美、法、俄、德、印度等国“无不以通商致富”，“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郑观应、汪康年以及曾国藩等人，还把对外商业竞争称之为“商战”，而商人是商战的主角，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便中国在对外商业竞争中能取得胜利。重商思想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批判，主要流行于洋务运动时期。重商思想家们认为国家发展的基础——财富，主要来自于流通领域，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却反映了近代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理论特点。这些主张得到了当时洋务派领导人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采纳，并付诸实施，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早期改良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政策性线索。

二、孙中山的实业救国理论

孙中山首创革命救国，同时又系统地提出以发展实业来推

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张。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不无兴奋地说：“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并强调：“中国人民号称四百兆，物产丰盛甲于全球，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就壑，吾等当首利用，以振兴其工商业。”他还号召华侨同胞为了国家之富强，回国投资，认为这“实系乎我同胞之能否负我国民之责任”。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的一段时期，孙中山将倡导实业建设、利用外资、鼓励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视为当务之急。孙中山除了在上海闭门立说期间完成了他的巨著《实业计划》外，还在各地演说中积极地宣扬他利用外资兴办实业的思想。他还阐明了利用外资兴办实业的三种形式：一是“借款修路”，“以公司营业性质，与外国资本家直接交涉借款”；二是“招股章程，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准外人入股’‘与外人合办’企业；三是‘批给外人修筑’，“批归外人承办”。孙中山本人更倾向于第三种形式，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本、人才和管理方法。朱执信、廖仲恺、黄兴等同时代的革命家也赞同孙中山的思想，只是这些思想未及实施，他们就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三、北洋时期的实业振兴政策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为时不长，但大力提倡“开放门户”、“利用外资”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需求，全国范围内也确实出现了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因此，在这一背景之下，尽管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在政治上极其反动，但在经济上并不排斥“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方针”。袁世凯还将一些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拉入政府，征求和采纳了他们实行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不少建议，制定了一些开放式的振兴实业政策和法令。北洋政权先后颁布了《公司案例》、《商人通例》、《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

则》等,以鼓励创办公司,扶植工商业 制定了《矿业条例》、《矿业条例实施细则》、《矿业注册条例》和《矿业注册条例施行细则》、《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等，以鼓励发展采矿事业，奖励垦荒以及棉、糖等副业生产等；拟订《农工银行条例》、《劝业银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法》等，以疏通金融，改革币制等等。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和军阀间的混战，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际效果极为有限，但它们并没有随着袁世凯个人势力的垮台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民族资产阶级的意志，并与以后的提倡国货运动相融合，也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

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论

乡村建设派，是一个以农村建设为社会改良的基础与核心的政治派别。 20 年代末，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与崩溃的过程大大加剧了。由于农村购买力的降低，帝国主义无法推销它的商品，地主收租也发生了困难，国内外的许多政治力量，都把眼光集中于中国的农村，帝国主义者叫嚷着要救济中国农村，国民党政权为巩固自己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在行政院设立了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高唱农村复兴的调子。一些知识分子也认为，医治日益凋敝的农村，是解决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所在。一时间，打着复兴农村的旗号，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者，时人都称之为乡村建设派。其代表人物是在山东邹平、菏泽搞实验县的梁漱溟。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既不是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中国不需要任何变革，只要到乡间去从事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为核心的工作，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具体做法有：一是建立“乡农学校”，校长、校董由当地豪绅担任；二是建立“乡村自卫组织”，吸收地方知识分子参加；三是建立

“合作社”，以增加农民的互助联系。总的目标是把农民的文化学习组织和政权机构合一，以实现乡村政、教、兵、财的一体化。在梁漱溟看来，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容纳了政治、法律与国家在内的民众教育，一旦农民普遍接受了它的内在理性，包括政治在内的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完满的解决。他是以文化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他希望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建立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结构是“中国精神＋西洋长处”，其具体公式为“理性十民主与科学”。由于梁漱溟不承认当时中国农利中严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因此他自负地认为，他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要比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农民运动高明得多，甚至可以替代共产党。这种主张后来遭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批判，他所实验的“乡农学校”和乡村自卫组织也分别成为土豪劣绅进一步控制农民的“自治机构”和地主武装，至于合作社则不了了之。

五、以教育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

平民教育是“五四”民主精神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一些知识分子推行平民教育，大多受杜威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企图以教育为救国、兴国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实现平民政治和社会改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曾在北京参与组织中华贫民教育促进总会（1923 年）并任总干事的晏阳初（1890—1990 年）。晏阳初认为，“愚、穷、弱、私”是中国目前的大患”，是中国人生活上的四种基本缺点，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其根源是中国教育不能普及，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提倡用教育手段来改革社会，复兴中国。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宣称平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造人，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农民，人人都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能自养、自卫、自立而成为‘人’，那么中

国民族便立刻可以复兴”。在 30 年代初期晏阳初还选择河北设立了“县政建设研究院”，并组织农民成立“公民服务团”，大力宣扬扫盲、卫生，改进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方式和改良家畜，试验新法制造火腿及熏肉等。这类活动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流产。

六、苏区的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 30 年代除了提出自己的土地革命理论外，还在自己所建立的政权范围内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他既批评了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的观点，又批评了“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① 当时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给农民分配土地的前提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实行耕种互助。苏区普遍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还有农具合作社、种粮合作社。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程度更高的农业合作组织——合作农场、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组织对发展落后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起了很大作用。在工业方面，为了适应群众生活的需要，苏区也建设了一些民用品工厂。以中央苏区为例，民用工厂就包括制糖、制盐、纺织、煤炭、炼铁、造船、农具以及纸张、烟草、樟脑、肥料、医药等行业。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还成立了对外贸易机关，加强对输出入商品的管理，并直接着手经营粮食、盐和布的贸易。 1934 年春，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出入口公司——中华商业公司，同福州、厦门和

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05．109 页。

广州等地进行了大宗贸易。此外，还建立了信用合作社。这些经济发展的措施，以后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有了进一步的展开。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服务于革命战争，是一种战时经济，但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初步的经验和发展的雏形。

1.4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理论线索

人类 20 世纪下半叶聚焦于发展问题。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发展问题是一个最持久、最有争议、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联合国自 1960 年起，已连续制订了三个国际发展规划。世界银行自 1978 年起每年刊行《世界发展报告》。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 1994 年宣称："发展应被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先、最具深远意义的任务。"①

近 50年来，从国际社会关于发展思想的演进来看，大致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变，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发展理论。

一、单纯的经济增长论

这是战前形成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经验为依据的传统发展理论。它以经济增长为追求目标，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整个社会生活就可以大为改观，如可以实现社会稳定、政治民主化，克服贫富悬殊，等等。这种观点对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曾起过相当大的影响。在 50—60 年代，绝大多数国家均以联合国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5%为社会发展指标。

经济学一直沿着经济增长的路子探索社会发展问题。在经

① 本杰明·里弗林：《发展的困境与联合国内的紧张关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 年第 5期，第 155 页。

济学讨论中，“增长”和“发展”有时作为同义词使用。学术界开始用经济发展取代经济增长并且将二者区分开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发现，既存在着有发展的增长，也存在着“没有发展的增长”。例如，经济学家 R·克劳尔发现，利比亚在 60 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而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其他经济部门没有相应增长，也没有能将实际收入的利益分配到各个阶层。有人甚至作出这样的结论：在政治上落后和社会不平等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社会越不稳定，收入与分配越有利于高收入集团而不利于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

当代经济学在对经济增长概念重新切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动了发展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内的繁荣。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在讨论什么是“经济发展”时，最后都讨论到了“发展”一般上，突破了“经济的”限定。社会发展意识的猛醒，不仅强烈地刺激了经济学，同时也强烈地刺激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将发展问题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二、综合的社会发展理论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到了 70 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持久的“滞胀”、“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恶劣态势，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源浪费和短缺加剧，贫富差距拉大，产业结构畸形，债务有增无减，造成“有增长而无发展”。平民教育、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等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进步因素，都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这种实践结果，使人们的发展观产生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增长是规模的一项指标，它是从发展中获得自身意义的”①，而发展除了生产数量上的增长

①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序言部分。

外，还包括经济结构和其他制度的变化，不仅包含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包含社会全面进步。

70 年代，国际社会对传统发展理论的扬弃，有过两次重要的拓展。一是 1976 年国际劳工组织在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主张以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普遍满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为目标，把发展解释为“社会为其成员谋求长远福利的能力之增加”，认为基本需求“是一个社会应当为最贫穷阶层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满足基本需求意味着满足各个家庭对衣、食、住个人消费的最低需求，意味着可以获得清洁用水、下水道卫生设施、运输、保健以及教育等方面必不可少的服务，……。”① 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9 年 8 月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专家会议，提出“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新发展观念，强调“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②如果说，第一次拓展是通过制订人道的、保障生存的各项指标去实现社会发展的最低目标的话，那么，第二次拓展则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资源节约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从而也把人的需求，从解决生活、生计问题，提高到了追求自由、幸福，享受智力和精神生活，实现自我教育和解放等人格发展的高级阶段。

法国学者 F·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对综合的社会发展观作了较为详尽的理论阐发。所谓“整体的”，是指发展须有整体观，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人的各个方面，又要考虑到他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问题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各个部

① 国际劳工局：《就业、增长和基本需求：一个全球性问题》，1977 年英文版第 7 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 4 页。

门、地区和社会阶级，要在发展过程中求得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则是指充分正确地依靠和利用本国的力量、资源，包括文化价值体系来促进发展。① 书中认为，“如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在空头支票的掩饰下对他们进行剥夺，发展就不能发生。”② 鲜明地提出了“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③ 这样深远的战略目标。综合的社会发展重在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主要方面的整体进步，揭示了人与社会之间或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开始从传统发展观念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位的发展。

按照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瑞典 DHF）的解释，综合的社会发展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 1. 面向需求，2. 内生，3. 自力，4. 生态上合理，5. 改革。其中第四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三、可持续的发展理论

作为人类全新的发展理论，持续发展是在全球面临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问题的情况下，人类从自身的生产、生活行为的反思和对现实与未来的忧患中领悟出来的。

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过程。1949 年，美国学者 W·福格特推出了《生存之路》一书，成为继 1798 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再次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和生存问题注意的理论著作。而美国女科学家 R·卡逊 1962 年发表的科普小说《寂静的春天》更引起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到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一书，终于使世人认识到

①②③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3、201 202 页及序言部分。

人口、粮食、资源、环境和工业增长等问题已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全球性危机，从而引起全人类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 1972 年 6 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人类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一个里程碑。今天看来，1972 年会议的主题虽然偏重于讨论由发展引出的环境问题，而没有更直接地关注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但已经爆出了某些与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有联系的思想火花。会议报告中写道：“实际上联合国对这次会议的要求，显然是要确定我们应当干些什么，才能保持住地球不仅成为现在适合人类生活的场所，而且将来也适合子孙后代居住。”

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和推行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 1983 年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该委员会，组织世界范围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经过三年的深入研究，于 1987 年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个能持续人类进步的途径。我们寻求的不是在几个地方、在几年内的发展，而是整个地球遥远的将来的持续发展。”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明确定义为“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已经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在未来，我们应该致力于走出一条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兼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从一般地考虑环境保护到强调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这是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

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二个里程碑。会议通

过和签署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全球性的行动。这次会议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而且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了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找到了一个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综合发展不同，可持续发展重在阐明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要素方面对发展的制约；强调发展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地膨胀的，只能在给定的范围内追求给定程度的发展；并且认为关注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必须同考虑发展的后劲和代际之间的发展需求问题结合起来。但是不可忽视，发展的社会综合方面与发展的自然持续方面两者是强烈互补的，它们是推动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两个方面。总之，可持续的发展观与综合的社会发展观之间有较多的继承关系，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后者的侧重点是横向的、同时性的，即寻求一个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诸方面的尽可能协调一致的发展，而前者的侧重点则是纵向的、历时性的，即强调兼顾人类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 1992 年以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1994 年在俄国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其主题为“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会议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1995 年的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可持续发展虽然缘起于环境保护问题，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

和谐和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

1.5 发展的时代意义

发展问题是与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密切关联的。对20世纪究竟是怎样的时代，长期以来，我们是沿用列宁的分析，以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其主要特征的。列宁的观点究竟对不对呢？应该说，基本上是对的，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试看，人类长达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世界范围的战争，而在20世纪上半叶短短的50年内，却接连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俄国、德国、匈牙利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在俄国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导致了中国、东欧、朝鲜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列宁对于时代特征的判断的正确性吗？问题在于，列宁的判断有它的时限，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化，列宁的判断也不再完全适用了。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并没有相应地作出改变。“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①] 因此，经常是在临战状态下部署我们的工作，这就严重影响自己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邓小平同志仔细地观察了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而这两家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谁也不敢先动手，并且它们的全球战略部

①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署也都没有完成；同时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①

在国际局势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体制，开展技术创新，使经济有所发展，普遍的革命形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并未出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与原有的欠发达国家一起，形成了当前占世界人口 74%、世界面积 59%的 130 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少数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了突出的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后者富的愈富，前者却穷的愈穷。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而“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

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③ 另一方面，只有发展，才能巩固和保障和平。“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④

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发展问题具有新的内涵和意义。

①参见《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6、127 页。

②《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 页。

③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6—117 页。

④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3 页。